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Literature

Masao Otani

**Abstract:** Japanese literatur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 with its inceptions, continuing through modern tim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anyōshū* (*Collection of Ten Thousand Leaves*), the oldest anthology of Japanese poetry, was compiled in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By this time in China, the *Book of Songs* (*Shih Ching*) was older than a millennium, and the famous era of the High Tang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Li Bai and Du Fu had also passed. When Japanese literature came into existence, China already had a fully mature literary tradition, so it was natural for Japanese literature to learn from its neighbor during its formativ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has often been misunderstood as a history of imit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Yet, in spite of the similarities of rhetoric and expression which can be seen as imitative, in those same works of literature, one can also easily discern some unique features deriving from the indigenous Japanese culture. For instance, the mirror was imported from China to Japan in the fifth century C.E., and Japan even borrowed the custom of using mirrors as parting gifts. Whereas in China the mirror was seen primarily as a token of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Japanese context it became an object of worship believed to contain a holy power, as well as human or divine souls. Moreover, in ancient Japanese culture, the mirror was also used as a symbol of feminine beauty. Both these new symbolic meanings cannot be foun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urthermore, for Japanese people and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there is a strong sense of incongruity in using quantities of money to describe the quality of beauty. Such a Japanese sensitivity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xpressions like “costs thousands of gold pieces” and “worth ten thousand in gold” to “cannot be changed for thousands of gold pieces” and “more valuable than ten thousand in gold”. These tenden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 plainly that in the Japanese imit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literary compositions also maintained and actively presented their own values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By comparing expressions like “mirror”, “time”, and several other key terms in their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exts, we can see how the terms take on different associations, and better appreciate fundamental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Japa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influence; taste; values; difference

**Author:** Masao Otani obtained his BA and MA degrees, and finished his PhD program in 1980, all from the Faculty of Letters at Kyoto University. He has serv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both Kyoto Prefectural University and Kyoto University, and is now professo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Faculty of Letters at Kyoto University. His main interest i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pre-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Classic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New Series: Man'yōshū*, Vols. 1–4; *Classic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New Series: Nihon Shishi, Gosando Shiwa*; *Classic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eiji Era, New Series: Kanshibunshū*; *Chinese Verses and Japanese Poems: Studies in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ich was awarded the Kadokawa Genyoshi prize in 2009), etc.

# 受中國文學影響的日本文學之特質

大谷雅夫



[摘要]日本文學自古代到近代，均受到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日本最早的歌集《萬葉集》大概形成於公元8世紀後半葉，與那時的中國相比較，不僅《詩經》已經出現一千多年了，也沒有趕上李白、杜甫的盛唐文學時期。兩者的關係，如同日本文學剛剛出生的時候，隔壁的中國文學已經完全長大成人，發展的進程有着很大的差異。正因為如此，人們對中日文學的關係，通常會持有一種觀念，認為日本文學如同日本的歷史，其產生與發展基本籠罩在中國文學的影響之下，兩者之間沒有什麼本質性的差異。然

而，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如果拋開偏見，深入到中日文學的具體事例來看，會發現儘管在題材、表達形式等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日本文學在審美意識以及價值取向等方面卻有着與中國文學迥然不同的傾向和特點。例如，鏡子在公元5世紀左右傳到日本，將鏡子作為離別贈品的風俗習慣也被日本人所接受。但是，日本人與中國人對鏡子的認識卻有着很大的差異。與中國人將鏡子看作可以銘記彼此關係的信物不同，日本人則將鏡子看做更具有某種神秘力量的東西。它既可以直接用來比喻人，也可以將人的靈魂蘊涵其中。這一點，是中國人的觀念裏所沒有的。另外，古代中國人還喜歡用金錢的數額來形容某種時刻的珍貴性；但日本人卻對這種觀念表示出不同的看法，在具體表達上也刻意進行了抵制。這些傾向和特點清楚地顯示出，日本人在接受中國文學的同時，也格外積極地在保持和發展自身的價值觀和審美意識，並且用極為獨特的形式將其表達出來。這些體現在中日文學觀念與價值觀上的差異，也是瞭解兩國文化本質的極其重要的綫索。

[關鍵詞]日本文學 中國文學 影響 審美 價值觀 差異

[作者簡介]大谷雅夫（才オタニ マサオ），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國文學科。1980年在京都大學博士課程修了，先後任教於大谷女子大學、京都府立大學、京都大學；現為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文獻文化學講座教授，主要從事日本古典文學、和漢比較文學以及江戸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萬葉集（1—4）》《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日本詩史、五山堂詩話》《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明治編 漢詩文集》《歌與詩：和漢比較文學論考》（獲2009年度角川源義獎）等。



## —

日本文學自古代到近代，均受到了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日本最早的詩歌集《萬葉集》大概形成於公元8世紀後半葉。而那個時候，相較於中國，《詩經》已出現一千多年了，也沒有趕上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的盛唐文學時期（713—739）。打個比方，如同日本文學剛剛出生的時候，隔壁家的文學已經長大成人了。所以，日本文學在幼兒時期、少年時期、青年時期，理所當然地一直在拼命模仿隔壁大人的舉手投足。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在《萬葉集》卷十九，有大伴家持（717—785）所作的，描述春天南雁北歸的和歌《見歸雁歌二首》。其中一首，內容如下：

燕來る時になりぬと雁がねは国偲ひつつ雲隠り鳴く

漢語譯文：待到社燕南來日，卻是秋鴻北歸時。

這種表達方式，毫無疑問，是身為讀書人的大伴家持從中國西漢皇族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及其門客集體編寫的《淮南子·墜形訓》中“燕雁代飛”學來的。正如東漢的高誘註所言：“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北，詣漢中也。燕，秋分而去；雁，秋分而南，詣彭蠡，故曰代飛也。”燕子在春天從南國飛來，大雁在同時歸往北國。這首日本和歌，是將這種觀察翻譯而成的。《萬葉集》卷十一裏還有一首可為例證：

劍大刀諸刃の利きに足踏みて死なば死なむよ君によりては

漢語譯文：若問愛君幾何深，腳踏利刃捨此身。

腳踏利刃、捨身赴死的表達方式是比較特殊的，在日本和歌中幾乎看不到。這一點，也是借鑒於中國南朝劉宋時期范曄（398—445）編撰的《後漢書·袁紹傳》中“登鋒履刃，死者過半”以及三國時期曹植（192—232）《諫取諸國土息表》中“蹈鋒履刃，以殉國難”等以身命救國難的中國文學中的表達。《萬葉集》的詩人們，正是通過學習中國文學，掌握了新的詩歌表達方式。

那麼，不斷汲取中國文學表達方式的日本詩歌，是否在形式和思想上也都與中國文學趨同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日本有一個諺語，叫做“三歲心靈伴終生”。無論是嬰兒還是幼兒，都會有個性。有人慢性子，有人神經質，各自不同而且很難改變。同樣，《萬葉集》雖然是日本文學的幼兒期和少年期，也已經有了他本身的“三歲心靈”，而且與中國文學的精神大不相同。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契沖（1640—1701）曾在《鐵槌書入》中概括了兩者精神的不同：

詩人愛酒，歌人好色，此乃和漢文學各自之本質。

意思是說，中國的詩歌比較喜愛寫酒，歌頌男士之間的交遊，以詩來表達飲酒中所體現的友情以及對理想的熱情；而日本的詩歌，則偏重於歌頌“色”——男女戀愛的內容，不太歌頌友情與理想，贊酒詩也極為少見。和歌與漢詩，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正因為有這樣的不同，日本文學所受中國文學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同時，對中國文學的接受還會隨着情況發生變化。例如，上述例子中，“腳踏利刃”雖然是受了中國文學中“履刃”的影響，但相對於中國文學以“履刃”來比喻赴國難，日本文學的“腳踏利刃”卻是在表達為了所愛之人寧願赴死的決心，內容上已經發生了轉變。

針對中國文學着重於表達政治志向，日本文學不太關心那樣一種正義。不僅是詩歌，就連日本近代的小說，也是在熱心地描述男女愛情。中日文學之間的這種差異，在“履刃”這兩個例子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學是如何汲取中國文學，又如何改變中國文學的。

## 二

通過對日本文學改變方式的探討，還可以進一步瞭解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彼此的特質與個性。這裏試以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品“鏡子”為例。

據《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記載，景初二年（238）六月，古代日本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的使者來到中國，魏明帝在贈送給使者的禮品中包含有“銅鏡百枚”。那麼，古代日本人是怎樣看待中國傳來的鏡子呢？

鏡子原本是用來觀看面容的道具，屬於實用品；但在《萬葉集》的和歌裏，卻有下面這樣一首：

住吉の小詰に出でて現にも己妻すらを鏡と見つも

漢語譯文：住吉橋邊客如雲，似鏡吾妻最迷人。

這首和歌，描述人們在橋邊聚集遊玩時，作者看到了自己的妻子，為妻子像鏡子一般美麗的面容而感歎。然而，在中國文學裏，卻沒有將鏡子視作“尤物”的比喻。換句話說，這首“萬葉和歌”反映的，是將鏡子作為愛物而非實用品，是古代日本人獨特的感受。

《萬葉集》中還有另一首有關鏡子的和歌：

まそ鏡見ませ我が背子わが形見持てらむ時に逢はざらめやも

漢語譯文：此鏡直是賤妾身，相見何愁須有時？

這首詩歌，描述的是妻子將一面“鏡子”送給將要遠行的丈夫。

在離別時贈人以鏡，是古代日本的風俗，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安萬侶（？—723）於和銅五年（712）獻給元明天皇那部記錄日本神話的《古事記》中，就有一則天照大神派遣子孫之神到人間時贈之以鏡的傳說。但這種風俗，其實是從古代中國與鏡子同時傳到日本的。在中國東漢時期，外出遠行的詩人秦嘉在寄給妻子的信《重報妻書》中有以下內容：

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稀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

在中國唐代小說《遊仙窟》裏，男女離別也以揚州青銅鏡相贈。此外，唐代詩人白居易（772—846）也寫過兩首高別之際得贈鏡子的詩，其中一首《以鏡贈別》寫道：“人言似明月，我道勝明月。明月非不明，一年十二缺。豈如玉匣裏，如水常澄澈。月破天暗時，圓明獨不歇。我慚貌醜老，繞鬢斑斑雪。不如贈少年，回照青絲髮。因君千里去，持此將為別。”這種贈鏡與遠行之人或留守之人的風俗，可能非常廣泛地存在於中國社會。因此，訪問過中國的日本人，在歸國時也曾經體驗過。所以，可以推測，贈鏡的風俗是與鏡子一起傳到日本的。

然而，雖然在古代中國和日本都有臨別贈鏡的習慣，但其中的意義卻並非完全相同，甚至全然不同。首先來看，中國人為什麼要在離別時贈送鏡子？對此，鏡子上的銘文有所暗示。例如，根據三木太郎編輯的《古鏡銘文集成》，中國漢代的鏡子上面，常常刻有如下簡短的銘文：

1. 見日之光，長毋相忘。
2. 願君毋相忘。
3. 願長相思，久毋見忘。
4. 長相思，毋相忘，常富貴，樂未央。

這些銘文的大意，均為“毋相忘”——不要忘記；“長相思”——永遠思念。作為送給離別之人的物品，再沒有比這些語言更貼切的了。然而，這種離別贈言，與鏡子銘文本來的意思是否相同呢？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贅言，鏡子是古代中國青銅器的一種。各種青銅器上的銘文，在周代以後，常常以“其子子孫孫永寶用”為結尾。銘文的意思，是希望擁有青銅器的子孫，永遠以之為寶。此外還有如：

1. 其自今日孫孫子子毋敢望白休。
2. 子子孫孫永寶用，勿遂。
3. 武文咸刺永世毋忘。

這裏的“毋忘”，是指要永遠珍藏青銅器，不要忘記器上所刻的人名及其事迹。

當時還有一種叫做“精白鏡”的鏡子，上面的銘文通常較長而且文字間或有出入，很難讀解。其中，有這樣兩句：“煥玄錫之流澤，恐疎遠而日忘。”大意是說：因為玄錫而明亮光輝，



卻擔心被逐漸疏遠和遺忘。“玄錫”指的是用來磨鏡子表面的錫粉，或許是水銀。如果“煥玄錫之流澤”，可以解釋為“鏡子因玄錫而閃閃發光”的話；下面的一句，就一定是擔心鏡子的主人疏遠它、忘卻它的意思。所以，這一句的意思，正是要求主人不要忘記每天磨鏡、怠慢鏡子。

從上述青銅器銘文的類型和精白鏡“恐疎遠而日忘”的意思來看，“毋相忘”“長相思”這樣的鏡子銘文，本來的意思是不要忘記這面鏡子，要永遠使用它。而這樣的字眼，最符合離別的場面，是最典型的離別贈言。所以，古人在離別時把鏡子作為贈品，很可能是因為鏡子的銘文與遠行者及送行者的心情相互契合，可以用來寄託彼此的願望。

那麼，古代日本在離別時贈送鏡子的原因又如何呢？妻子送給遠行的丈夫以鏡子，天照大神送給人世間的子孫以鏡子，其意義究竟如何呢？是否如同中國，與鏡子的銘文有關係呢？

針對這個問題，日本中世紀文獻中的月亮公主（“かぐや姫”）的故事有明確的答案。月亮公主做了皇后，後來要回到天上去；這時，她把一面鏡子作為信物送給了天皇，並說道：

若見思妾，則可見此鏡，鏡中必有妾容。

——《臥雲日件錄》·文安四年二月二十日

原文就是用漢語寫的，意思是：映在鏡子裏的我，會永遠停留在那裏；祇要你想見我，就請看鏡子吧。這裏反映的，是古代日本人對鏡子的一種看法。

在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的送別詩歌裏，也有同樣的內容。例如，《後撰和歌集·離別》中贈旅途用品與赴遠國之人時，鏡匣內側寫道：

身をわくる事のかたさにます鏡影ばかりをぞ君にそへつる

漢語譯文：賤妾分身雖乏術，吾影長伴在君側。

意思是說：雖然我不能伴隨你遠行，但映在這面鏡子裏的我的影子卻可以被你帶在身邊。

前面提到的《萬葉集》中妻子送鏡子給遠行丈夫的詩歌，與上面這首詩歌相似，都是將鏡子看做是映照了自己影子的鏡子。《古事記》上卷記述天照大神送給子孫的鏡子，也應該是含有自己靈魂的鏡子。因為，在送給即將降臨人間的子孫鏡子時，女神這樣說道：“此鏡乃我魂也，當崇敬禮拜如神。”

在古代日本，鏡子作為離別贈品的風俗，是與鏡子一起從中國傳來的。但是，鏡子的意義，卻與中國全然不同。日本人的傳統信仰認為，枕頭、梳子等都附着了使用者的靈魂。現代的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幼，也仍然視腳踩枕頭為禁忌。因為，他們覺得，枕頭就是使用者的靈魂。另外，將梳子作為離別贈品的習俗，比鏡子還要久遠。這也是因為有視梳子為自己的分身的觀念。

鏡子作為贈品的習俗，雖然是古代日本人受了中國的影響，但其意義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成了與古代日本信仰中的梳子一樣的東西。換言之，鏡子在日本，作為映照了自己的影子，包含了自己靈魂的信物，被當作自己的化身來贈與他人了。

### 三

除了鏡子作為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用具，折射出中日兩國不同的觀念和信仰外，事實上，中國文學影響日本並在日本發生變化的例子，自古代到近代數不勝數。下面試以蘇東坡（1037—1101）的《春夜》詩在中世紀日本的流行作為例證：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沈沈。

這是一首極為有名的詩，多次被編入日本高中的漢語教科書中。眾所周知，這首詩並沒有收在《東坡集》裏，而是被收在南宋魏慶之撰寫的《詩人玉屑》中，並在該書卷八附有如下評論：

誠齋論東坡介甫詩：流麗相似

東坡云：“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人寂寂，鞦韆院落夜深深。”

介甫云：“金爐香盡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那麼，這首詩是什麼時候被日本人知道的呢？最初讀到這首詩的日本讀者，可能是生活於鎌倉時代的花園天皇富仁（1297—1348）。這位天皇因為喜好學問而聞名。在《花園天皇宸記》的天皇日記裏，正中二年（1325）十二月二十八日寫道：“近代有新渡書，號《詩人玉屑》，詩之髓腦也，與和歌義全不異。見此等之書，歌義自可披蒙。”這裏所提到的“新渡書”，即剛剛傳到日本的書籍《詩人玉屑》，不久之後便在日本出版了。一位叫做玄惠（1279—1350）的學問僧，在通讀了《詩人玉屑》這本書之後，便按照日語的語法順序用標點（訓點）將全卷標點後出版了此書。所以，該書又被稱為“五山版”。

《詩人玉屑》裏這首蘇東坡的詩，是在14世紀初期傳到日本的。而詩中給人印象深刻的“春宵一刻值千金”這一句，幾乎同時被日本的詩歌所汲取。例如，出版《詩人玉屑》的僧人虎關師練（1278—1346）所著詩集《濟北集》中，有兩首詩歌顯出蘇東坡《春夜》的影子。一首是《漫興》中有：

一刻千金春夜夢，  
曉鐘未破被鷄分。

另一首是《和七夕韻》中有：

千金酬一刻，  
幾許直今宵。

除了“千金”一詞，人們還可以看到“一刻”，顯然是受到了蘇東坡詩的影響。此外，花園天皇的弟弟尊圓法親王（1298—1356）參與的“守遍詩歌合”（1356年成立）中，也有以下兩句：

月中桂一朵誰切，  
春夜直千金尚微。

大意是，因為月中的桂樹被折去了一枝，月光顯得有些暗淡，朦朧月色，非常美麗。稱如此春夜為“直千金”，未免有些“微”——太便宜了吧。

可以看出，蘇東坡的詩首先在14世紀的日本詩壇被廣泛接受了；其後，影響便在歷史中逐漸展開。例如，飛鳥井雅親（1416—1490）的《亞槐集·寄金述懷》中有：

おろかにて月と花とをいかがみんちぢのこがねもよしや春の夜  
漢語譯文：春花當細賞，春月須細觀。春宵吾所愛，千金值幾錢？

又如，三条西実隆（1455—1537）的《雪玉集·寄金戀》中有：

時のまもあふ夜にかへむ物はあらじいかばかりなるちぢのこがねも  
漢語譯文：春宵苦短，會面實難。若得相見，千金幾錢？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這兩首和歌均是關於戀愛內容的。可以看到，與前面所提到的“劍大刀”的和歌以及中國書籍中的“履刃”一樣，相對於中國詩文着重寫“志”，日本和歌則是把愛請放在中心位置的。當和歌從漢詩中得到新的表達方式時，總是將其轉換成戀愛的內容。除此之外，還有烏丸光廣（1579—1638）的《黃葉和歌集·春夜》中有：

をしめ猶ただ一時も春の夜はちぢのこがねにかへんものかは  
漢語譯文：勸君一刻不可輕，千金難買春宵夢。

另外，在中世紀的傳統藝術表演謠曲中，“春宵”這句詩還被許多曲目引用和運用。例如，15世紀室町時代的作品《田村》中有：

春宵一刻，價千金，花に清香，月に影。実に千金にも，換へじとは，今此時かや。  
漢語譯文：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千金難買何所謂？正是生逢此時分。

如上可以看出，中國文學的表達被日本文學所接受的歷程：中國的詩歌先是影響到日本的漢詩，



然後再波及到和歌以及其他假名文學當中。蘇東坡《春夜》詩歌的傳播，堪稱典型。

然而，在影響的過程中，有無轉換和改變呢？東坡的“春宵一刻值千金”與日本的詩歌意義完全相同嗎？答案是：不同。因為，相似的例子祇有前面提到的虎關師練的第一個例子。第二個例子是在說：如果一刻值千金的話，七夕的一個晚上又值幾多呢？簡直就是無價！另外，尊圓法親王的詩也在強調“千金尚微”。還有和歌與謠曲的例子，都在以“千金也難買取”或“千金能買到嗎”的反問形式，來否定用金錢來交換春夜良宵的想法。

#### 四

“價值千金”與“千金難買”，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表達和思想。蘇東坡的詩句傳入日本後，在日本詩文中被迅速地轉換和改變了。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但迄今為止的中日比較文學研究，似乎一直在忽略這個問題。然而其中所蘊涵的，或許就是中日文學乃至思想的某種本質性的問題。雖然目前暫時不能說明這種轉換和改變的意義，但在此想再提供一些例子，以便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蘇東坡的詩句“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表達方式，並不是蘇東坡的發明，漢代司馬遷（前145—前90）所著《史記·孟嘗君列傳》中就有：“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它在中國的詩歌中，也是一種類型：

相思千萬里，一書值千金。  
——李白《寄遠十一首》第十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杜甫《春望》

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百憂當二月，一醉直千金。  
——白居易《送常秀才下第東歸》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  
——蘇東坡《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

這種表達，對平安時代的日本文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因為，平安時代的日本文人非常喜愛唐詩，特別是白居易的詩歌。而在白居易的詩歌中，還有一些“直萬金”的句子：

無如飲此銷愁物，  
一餉愁消直萬金。  
——白居易《對酒》

始知洛下分司坐，  
一日安閑直萬金。  
——白居易《閑臥有所思二首》其一

莫輕兩片青苔石，  
一夜潺湲直萬金。  
——白居易《南侍禦以石相贈助成水聲因以絕句謝之》

這些詩句都在強調，短暫的閑適價值萬金。這也立刻成為平安時代日本漢詩作者的模仿對象。例如，長谷雄的《閑居樂秋水》中就有“晚日寒聲直萬金”，完全模仿了白居易的“直萬金”的表達。又如，《夫木和歌抄·綾》收錄了權僧正公朝（生卒年不詳，約13世紀後半葉）的《六帖題·綾》，其中有：

土にひく春の衣の一がさね千千のこがねの数にまされり

漢語譯文：縱然春衣曳春泥，其價何止勝千金？

這首和歌，很有可能是借用了白居易的新樂府《繚綾》：

昭陽舞人思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

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地踏泥無惜心。

因為，《六帖題·綾》正是將白居易詩的內容，轉換成為舞女的衣裳勝過千金的意思，“直千金”也被改做“勝千金”。還有一首詩，收錄在與《源氏物語》同時完成的《本朝麗藻》（高階積善編撰）裏，其內容如下：

花落春歸共背心，更遮行路共相尋。

風和過處多薰地，鳥老去程漫謝林。

媚景臨岐殘雪亂，芳辰按轡晚霞深。

光陰苒苒當頭走，一日追歡勝萬金。

——藤輔（藤原輔尹，生活在公元10世紀中葉）《花落春歸路》

由此也可以看出，不僅是在日本的中世紀，詩人以及和歌作者一面汲取蘇東坡“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表達方式，一面將意思轉換為“春夜直千金尚微”“春宵吾所愛，千金值幾錢”“春宵苦短……千金幾錢”“千金難買春宵時”“所謂千金難買物，正是生逢此時分”；而且，上溯到平安時代，也有詩人通過“一日追歡勝萬金”的表達，來強調歡樂的價值勝過萬金。

其實，再往前追溯，在《萬葉集》卷五中收錄了山上憶良（660—733）的作品《思子等歌》，歌中寫道：

銀も金も玉も何せむにまされる宝子にしかめやも

漢語譯文：金銀寶玉何所值，吾子吾女更勝之。

作者強調，孩子在世上比任何金銀財寶都要寶貴。這種將孩子比喻為寶物的想法，有可能是受到佛典的影響。在上古日本曾經被廣泛閱讀過的《過去現在因果經》裏，有一段文字，描述了父親百淨王在聽到太子出家後的辛苦而發的慨歎：

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寶之子。

假如山上憶良真的受到《因果經》的影響而寫了“吾子吾女更勝之”的話，佛典視孩子與寶物同等的思想，還是被改做“勝於寶物，寶物何所值”這樣的意思。

以上的例子都顯示出，用“等於千金、萬金、珍寶”形容美好事物的表達方式，被日本的和歌作者以及詩人接受以後，大多改變為“千金、萬金、寶物亦難企及”的意思。究其原因，雖然至今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答案，但這裏不禁使人想起英語中的一句話，叫做“Look a million dollars”，意思是指(女性)看上去很美麗。然而，一個以日語為母語的女性，可能不會因為被恭維說“你看上去像價值一億日元”而高興。換言之，“千金”也罷、“萬金”也罷、“a million dollars”也罷，對用金錢來判定美的價值的做法，日本人及日語均有着強烈的抵觸感。將“直千金”“直萬金”轉換為“千金難買”“勝千金”的背景，正是基於這樣的審美觀。而這，也許是轉換和改變的原因之一。

[編者註：該文係約稿，由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王小林教授翻譯。]